

慈惠堂叢書

Tsyr-Huey-Tarn
Series

ISSN 1819-0200

第八輯

新儒學經營管理學報

Journal of Neo-confucia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Volume 8

慈惠堂出版社恭輯

Tsyr-Huey-Tarn Publishing House

九十八年六月

June, 2009

慈惠堂叢書

Tsyr-Huey-Tarn
Series

ISSN 1819-0200

第八輯

新儒學經營管理學報

Journal of Neo-Confucia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Volume 8

慈惠堂出版社恭輯

Tsyr-Huey-Tarn Publishing House

九十八年六月

June, 2009

新儒學經營管理學報 第八輯 J. of Neo-Confucian Bus. & Mgt. Vol.8

三九四

慈惠堂叢書

第三十六冊

新儒學經營管理學報 第八輯

Tsyr-Huey-Tarng Series

Journal of Neo-Confucian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初版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保留版權・翻印必究

Volume 8

贈閱品

ISSN 1819-0200

發行人與主編：林國雄

出版者：慈惠堂出版社

Tsyr-Huey-Tarng Publishing House

台灣省南投縣竹山鎮大明路一五〇號

150, Taming Road, Juw-shan Town

Nan-tour County, Taiwan, 557, R.O.C

劃撥帳號：

慈惠堂管理委員會 二一一〇一五九八

每本含郵資之工本費為新台幣六〇〇元整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省業字第 四六〇號

主編的話

Editor's Words

文史哲一般將新儒學狹義地界定為，宋明時期的儒家思想，亦稱理學、道學。由其道學的稱呼可知，新儒學與道家、道教的關係是非常深厚的。Neo-Confucianism則原來是西方人對宋明儒學思想的稱謂，以區別於漢唐以前的舊儒學。新儒學已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辨哲學和宇宙化生模式，但宋明時，只注重闡發心性義理之學。其奠基人為北宋周濂溪、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等，至南宋，朱熹建立了其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以即物窮理，來成就聖人之德業，只可惜缺乏「心」與「物」的陰陽兩儀之良性互動對待。

與朱熹同時的陸九淵，另建立了心學體系。至明代，王陽明乃集心學之大成，斷言「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提出致良知的為學、修養方法，強調知行合一。而北宋時，張載所提出的「氣一元論」與程顥、程頤二程所提出的「理一元論」，實際上是一種以氣為陽、以理為陰的新儒學陰（理）陽（氣）兩儀之互動對待。一般認為，新儒學闡發的心性義理之學，已成為現代新儒學的源頭活水。但此種觀點仍太狹窄，仍太本位，忽視了道家、佛家對新儒學的深厚導引。本人認為，新儒學對道家、佛家的優秀成份，仍應繼續吸收消化，還應進一步與西方的民主、科學、經營、管理

之優秀成份，合理而緊密地再連繫起來。

本新儒學經營管理學報在中國慈惠弘道功德會、慈惠堂、及各界的關切支持下，已順利出版了前七輯。本學報以融貫儒學、道家、佛家及西方的民主、科學為職志。此一專業學術及實務期刊，在草創初期，因參與人尚少，故第八輯仍只刊登邀稿一篇、已通過評審的論文兩篇、及推薦兩篇。新儒學因特別重視整體性的思維，有別於西方人常用的局部性思維，故新儒學（本人有時亦稱其為新道家）特別具有其融貫潛力。本學報若能將儒道釋及西方民主、科學的優秀成份再進一步融貫起來，預期當能相得益彰。

至於本學報第八輯亦繼續做了綜覽，刊登台灣運輸倉儲及通信業的经营綜覽，以明新儒學視野之適用性。而墨子及其今義之二，則為第七輯墨子及其今義之一的繼續。本學報第八輯校對疏誤、考慮欠周、或其他疏漏之處，仍在所難免，尚請各界方家，多賜批評指教。

主編 林國雄 敬識

Editor, Kuo-hsiung Lin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June, 2009

新儒學經營管理學報第八輯目錄

Journal of Neo-Confucia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Vol. 8

主編的話

Editor's Words

壹、邀稿 Invited Paper

良知的四層涵義及其當前意義

成中英

—

The Four Levels of Meaning of Pure Moral Knowing and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s ----- Chung Ying Cheng

貳、論文 Papers

論五行經營生剋的真性與假性相關

林國雄

九

True and Spurious Correlations of Five Agents in Business Raising and Constraining - Kuo-hsiung Lin
淮南子的自然思想 ----- 林國雄 六五

The Natural Thought of Huai Nan Tzu ----- Kuo-hsiung Lin

參、推薦 Recommended Reprintings

哈耶克對社會正義的批判

內 夫

九九

(三)

楚辭自然生態意識審美

李金坤

一二六

肆、綜覽 Bird's-eye View

台灣運輸倉儲及通信業的經營綜覽

中華大學國企系

一八〇

墨子及其今義之二

二九三

伍、附錄 Appendixes

新儒學經營管理學報編輯理念、稿約等

三七九

Journal of Neo-Confucia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Editorship, Information for

Contributors, etc.

新儒學經營管理學報編審委員

三九〇

良知的四層涵義及其當前意義

The Four Levels of Meaning of Pure Moral Knowing and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s

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

成中英 Chung Ying C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problem of how to understand human heart-mind as realization of good will, namely the will to do good independently of any selfish considerations. One needs of cours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elfishness and self-centrality which is the source from which liangzhi(良知 pure moral knowledge) realizes itself. Once liangzhi is realized in daily life experience of good, liangzhi will emancipate the self from its selfishness and broaden its self-centrality in such a way that liangzhi will bring out more good intention or good will into inner understanding and outer practice or behavior. This leads to WYM(王陽明)'s formulation of his doctrine of realization of liangzhi(致良知 zhiliangzhi) on the basis of unity of moral knowledge and moral practice which pushes for more realization of the liangzhi. Finally, I show how liangzhi has four levels of

meaning in terms of the Four Sentences Teaching(四句教 Sijujiao): liangzhi is original reality (本體 benti), liangzhi is will to good; liangzhi is moral knowledge, and liangzhi is practice of doing good and eliminating bad. It is my argument that in today's globalized world where greed and selfishness run wild, we cannot find a real rescue and cure unless we educate and cultivate for our individual liangzhi as a human being and for our collective liangzhi as a group such as a community, a state and a whole world.

正文

1. 心之為理：

心是一個整體的概念。陽明並未分析的界說心，但他卻直接了當的說心即理，而其他有關心的話，在傳習錄與書信中處處皆是。他說：「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許外面添一份，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從這幾句話來看，心即理，即是心有理的功能，能盡理的責任，是一個活潑生動的生活與價值實現能力，當然也就是為善去惡的能力。

說心即理，不是說心之所指即是理之所指，而是說我們對心的理解，應該因應我們對理的理解而有同等的內涵，但我們對心的理解與體驗，並不因之減少，卻反而增多。甚至更進一步，把我們對理的理解也豐富化了，而有心的涵義。如此，就把本體

性的理和現象性的心連貫起來，也把偏向靜態性的性理和動態性的心念貫通起來，形成了一個動靜相需、持續不斷的生命體系，這也就是人的本體了。這也說明心之為心，仍可以是理的一種狀態，同時也說明理之為理，仍可以是一種活動。心即理，說明氣與理不但不可分，而且相互帶動發展出人的心性一體的生命動力體系，直接指向知行合一之說。

2. 知行合一的兩重涵義：

從心的本體之理與心為性理之系統展現為心的知行功能，陽明發揮孟子心之官則思的思想：認知本體併同於本體，故心為本體，故有一切機能。心知的起點為知，其完成處即是行了。這樣賦予了知行一個內在的實現的體現的涵義，以及知行內在的一貫性與統一性。事實上，我們可以分析任何的實際知行的關係內在應有的統一性，都具有的兩個完整化階段：一是第一階段或知的完整化階段，從知之為意象或意念到知之為一個具有內涵的概念與命題，是有一個內在的過程與活動的，此點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道之甚詳。康德可說為知的起端的內涵與形式完成為知的完成的形式與內涵，提供一個生動的思辨說明，用心知心行來描述是恰當的。由有了知的概念與命題，如何實踐為價值或生命的目標，或如何形成道德的實踐就是行的完整化階段或第二階段的知行合一的問題了。在道德實踐上，陽明的良知之說就突出其重大作用。

他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他繼承了又發揮了朱熹對心之為昭明靈覺之活動的思想，而

直接了當的說為良知：「心之昭明靈覺處是良知」。

3. 如何進一步說明良知？我在此先為良知定性：

所謂良知者即是能就已知的情態及處境，觀其整體，察其動向指出應然的行為，此即所謂知善知惡，知微知彰。我要強調的有兩大要點：即是一、良知有結合經驗與心性潛能以做出正確活動判斷的能力，如此良知則為意志之善，或名為體現善之意志，故為道德的基礎；二、良知有推動、實行甚至創發的能力，故良知也是良能，是能持續的完成其所知並在兩完整化階段的基礎上實現善的意志與意志的善，亦即把意志判斷之善轉化為實際的善行善事。此點又可借重康德的道德哲學來說明。

4. 善意與良知：

康德的善意是先天的，而且是與人的性向往往對待的，故彰顯為「實用的純粹理性」。但就陽明說，心性是一體的，心且能自覺的也是自然的實現與凸顯而不與心性分離的良知，因為良知原就包含其中，為心性的內在創造性能。問題是如何體現此一至善的良知意志，當然這是一個修養問題，故涉及誠意正心以修己來達到身體力行的問題。此外陽明有一卓見：良知是可以透過意念來自行發動的。由於意念的發動是在已存在的事務之中，會受到習慣與物慾的影響，故意念的為善為惡卻必須良知的檢視與導向，方能自然的歸之為善了。如此此一善的意念就轉化為善的意志了。

在康德，意義有先驗的判斷與自我立法能力，故能獨立的發動「無上的道德命

令」，約束行為為善。兩者之別，陽明為直覺主義，認知良知的知與行、心與性的一體連通性，只要平時提煉，也就自然易行，左右逢源。而在康德，道德的意志的自我立法雖然嚴謹卻難免化內在為外在，往往流於形式主義，造成不必要的困境，失卻生命的自然自得。然而我們又不能不認識到在群體生活中律則的絕對重要性，尤其要認識到建立理性化的普遍化的律則，對權力的限制與權力的保護的絕對重要性。

5. 致良知的必然性：

在陽明的心性體驗中，從知行合一的要求必然走向致良知的要求，因為良知是善的根源也是善的起點，必須認知與體現了良知的本體性與價值性方能完成人之為人的要求。如何體現良知與發動良知是一個人生命中的大事。就陽明來說，他是要從大學的誠意正心開始，從誠意正心開始，事實上也是極為自然的事。因為良知的發動即是心之意念，意念一動就不能不加以注意，使其在起點上就歸於正。此即誠意之義。大學指出「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此之謂自謙。」因而如何誠意乃在自覺的感受自己的感受，所謂冷暖自知，做出切己如實的喜惡判斷。陽明以此為準，建立了他的一套道德的直覺主義。因而也就反對朱熹為大學格物致知所做的補傳，以此為多此一舉。現代學者有偏向陽明者，但也有偏向朱熹者。我個人的看法已在他處有所說明。

我在此只想簡單表明，格致與誠正也是屬於兩個層次的問題，而此兩個層次，直

感與理察，則不可偏於一面，方能確保道德判斷的正確性。尚有者，道德判斷往往是一個複雜命題，是要經過觀察、調查、研究、思考來得出結論的。而在此一調研過程中，直覺與直感卻是少不了的，而且還要有 second-order 的直覺方可。故而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是在一個準確認知過程中相互激盪的兩個要素，缺一不可。在我這一新的說明中，陽明與朱熹之爭自然也就可以得到了一個解決方案。此一中庸所說的「合內外之道，故時措之宜」，也就是「誠著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成物就不能不知於外，成己就不能不感於內（所謂仁也）。朱熹重知物成物，陽明重仁人成己，兩者並不矛盾。不但不矛盾，而且必須和合為一體，方能發揮人之為人、心之為心，性之為性之大用。

6. 親民與新民：

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顯然不能只靠直感，而必須要靠密察。也就是格致與誠正相互為用，方能達到明明德的效果。明德即是良知，明明德即是致良知。有了明德與良知，則不患善之不至。但實現善的次第，則可以由近而遠，由易而難。在此一理解下，朱熹訓大學原文「在親民」為「新民」，是忽略了近處而致遠，忽略了簡易而取難，陽明只強調原文「親民」之為「愛民」，卻是忽略了遠處而就近，忽略了革新之難而從易，都是不完整的。故而，我們也就是不能不強調兩者的互補性與貫通性。如此者，能把孟子與中庸、中庸與大學的思想融合

為一體了。

7. 良知的四層意義：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來理解陽明最後提出的四句教的涵義，也就極為容易了。說為容易，指的是意義分明而有實際與實行的重要性。上面提出，心即理即是心或心性的本體為理，理無實際的善惡，因其為本體的存在，可以看作一切存有的開始，無此理，則無此理的存有，有此存有則有此存有之理，良知理解為此即是至善。理落實為氣或原始的氣就成為意念或意向之所趨，善惡之分也就難以避免。我們可以把「有善有惡」的意之動看成立志的原始凸顯，其成為自覺的「有善有惡」也就是自然選擇與自由意志的基礎了。在此良知的力量已從存有發展為直覺或知識，變得更為積極。到了最後一個階段，良知以格物的方式做出積極的去惡行善的行動，顯然更清楚的實現其為道德的精神力量與意志了。

以此總結，我們得出來的良知的四個層次的認識即是：良知可以是具有潛層性存有，因而具有本體論的涵義。良知又有意志的呈現的活力，是可能性的主體的表露。然後良知運用其自覺能力來自自由的辨別是非善惡，是為道德知覺與道德知識的集聚。最後良知已不再是被動的存有甚或知覺與知識，而發展成為具有創造力道德改革的動力意志了。良知而有四義，既代表了整體的層次，又代表了一個過程發展的階段了。可以為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一個極為重要的模型。至善落實為具體的全體的善是要一

番整合內外的功夫，更需要一個建立在本體論、知識論、與實踐論上邏輯思考與價值創建。如此才能體會善為天地一體之仁的自我良知與集體良知。

8. 破山中之賊易，去心中之賊難：

從當代社會的種種道德問題來看，我們所最為缺少的即是個人良知與集體良知的發展與交會。良知並非本體的沒有，而是良知發動時即被淹沒，甚至沒有發動的機會。沒有良知的本體認識與肯定，所謂道德的主張與信念都會淪入相對與主觀，而道德的共識也就難以建立，因為沒有一個相互印證的內在標準，而只能依靠外在的權威來控制。外在權威並非無用，其權威性應來自保護與促進個人良知與集體良知的有效發用與實踐。陽明說「去山中之賊易，去心中之賊難」，難就難在反思的體悟不夠，觀察事態的成敗不廣，在根源上仍然是因循陋習，姑息貪念，流入反良知之行。如何發展良知的道德內在認知與認同，是當前建立社會倫理、國家倫理、國際倫理與全球倫理的終極基礎。今日紀念陽明五百週年忌辰，其重大意義在此。

（本演講稿講於第四屆國際陽明文化節高端論壇，貴陽修文。）

論五行經營生剋的真性與假性相關

True and Spurious Correlations of Five Agents in Business Raising and Constraining

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林國雄* Kuo-hsiung Lin

摘要

本文經由新儒學經營管理的合理新思維「向人類提出客觀問題，要求人類活動的客觀數據答復」，已經釐清真性與假性相關兩個基本概念。最後在五行經營生剋的情境內，完成在算術平均下的相關係數皆為假性相關，而在員工人數或業主權益加權下只有某些相關係數才是真性相關的論述。

關鍵詞

新儒學、五行、真性與假性相關、生剋。

Abstract

Through reasonable new way of thinking: "ask human being the objective problems and require objective data of human activities to answer" in Neo-Confucia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the author has clarified two basic concepts of true and spurious correlations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教授

新儒學經營管理學報 第八輯 J. of Neo-Confucian Bus. & Mgt. Vol.8

in this paper. Finally in the situations of business raising (生) and constraining (剋) of five agents (五行), he completes the argumentation that al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under arithmetic means are spurious correlations and only som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under number-of-employees-weighted or owner's-equity-weighted means are true correlations.

Keywords

Neo-Confucianism, five agents, true and spurious correlations, raising and constraining.

一、緒言

相關分析就客觀性的工商普查資料而言，均涉及聯合分配密度函數的設定。而此聯合分配密度函數的設定就是此對應代表性廠商意義的正確詮釋來源。此種設定至少有算術平均的設定、員工人數常雇當量加權的設定、業主權益加權的設定等各種可能設定。不過，在代表性廠商分析時，算術平均的設定有其基本瑕疵，但也是目前常被錯誤接受的設定（註1）。

算術平均的科學分析，既曾是實用主義（pragmatism）第一位的盲目生產力，又是乍看客觀的意識型態，但在工商分析時其所形成的常只是一種虛假的客觀意識，並不能使人們得到在科學探索活動上真正的認識與解說。Nicolaus Copernicus 太陽系學說的創立，已標誌著近代自然科學衝破基督教神學的桎梏而誕生。Immanuel Kant 還特別認為